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

THE IDEA OF  
PROGRESS

# 进步的观念

[英] 约翰·伯瑞 著 范祥涛 译



 上海三联书店

THE IDEA OF  
PROGRESS

# 进步的观念

[英] 约翰·伯瑞 著 范祥涛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步的观念/(英)约翰·伯瑞著;范祥焘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2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7-5426-2192-0

I. 进... II. ①伯... ②范...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145 号

### 进步的观念

---

著 者 / [英]约翰·伯瑞

译 者 / 范祥涛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mailto: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65 千字

印 张 / 17.75

---

ISBN 7-5426-2192-0

B·152 定价:26 元

## 美国版前言

近来,美国学者在著述中对进步观进行着广泛的探讨,信奉进步观的人们决定在芝加哥举办“一个世纪来的进步展”作为百年庆典,更使这场讨论达到高潮。这一切均使得推出伯瑞教授著作的美国版恰逢其时。本书是对这一观念发展史的博学探究,任何一位就这一主题进行论述或讨论的美国人均应研读此书。有些人认为进步观是最近才由商业界的公司创办者发现的,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由肤浅时代所提出的肤浅概念。通过研读这部书中富有审慎思考的章节,可以拓宽人的知识面,深化理解。书中内容完全根据伯瑞教授的原稿出版,仅增加一则引言,阐述书中主题的某些内涵。

查尔斯·A. 比尔德  
于康涅狄格州新米尔福德市  
1931年12月

# 引 言

查尔斯·A. 比尔德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尽管如此,惟有睿智的眼睛才能洞察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分界。而且,我们经常发现,一种与历史事实相悖的观念在实践中也许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例如,杰斐逊曾经写道:“人人享有天赋的平等权利。”当时的批评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人们在身体和智力天资以及社会地位方面的诸多差异。然而,杰斐逊的观念为人类精神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对社会制度(social system)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因为在法律面前,所有男人(和女人)<sup>1</sup>在理论上是平等的。

无论如何,一种观念决不蕴涵任何神秘主义意义上的潜在力量。正如弗耶利(Fouillé)所言,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换言之,观念并非一种纯粹的智力上的构想;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族,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尽管观念有时是由力量强大的个人为了将来的蓝图而阐述出来的,但是也经常来自模糊不清的源流,并在一段时期内被那些位卑言轻的弱

---

<sup>1</sup> 在《独立宣言》中使用的也是“男人”一词。从现代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措辞体现了男性的话语霸权,尽管一般将这个�翻译成“人人”。因此,作者于该词后在括号中添加“女人”一词。——译者

者所珍视，最终战胜一切漠视和压制，在一个文明时代的整个进程中取得主导地位。

虽然这些阐述显出学究气息而又十分遥远，却有着非常的现实意义。惟有意识到观念的重要性，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宪法运行的民主政府。这种政府的建立基础是这样一种假设，即由根本法律制定的整体框架内的一切社会冲突的消解，都是通过观念的交流实现的。对于一个基于舆论的政府而言，绝无其他选择，除非采取暴力。

观念不仅在政治中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在文明生活的每个领域也都居于支配地位，如艺术、文学、经济和社会风俗。几乎可以断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与其在自己的劳作和志向中融入观念的程度成正比。仅有形式本身并不能使诗歌或散文影响久远，传承不朽。正如莫莱<sup>1</sup>所言，每一位伟大的著述者都会在沉思中表述人类广博无边的各种运动，既作出预言，也进行反思。而且，每个历史时代的观念通常都与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相关，而这一观念也为所有其他人确定了基调。历史学家的确大有理由将人类历史区划为不同的时代，区划的依据即是其各自不同的特征——依据各种事件、行为和哲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突显观念。由此，人类历史就经历了专制(despotism)时代、理性(reason)时代和民主(democracy)时代。尽管在这种区划中大有过分简化之虞，然而所有时代的整个发展过程均不容置疑地有其突显的特定思想类型，以及关于生命及其价值的特定构想。任何一位政治家、艺术家和作家都绝无规避其制约的可能。

而今，在过去两百年内对大众和个人事务产生影响的那些观念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像进步这一观念那样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也不太可能像进步这一观念对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古代的学者大多囿于一种恶性怪圈：他们认为人类围绕一系列发展阶段循环往复。这些学者之

---

<sup>1</sup> 西方历史上有多位与社会学有关的 Morley，但从本书的出版时间看，此处引用的应是西尔瓦纳斯·莫莱(Sylvanus Griswold Morley, 1883—1948)，哈佛大学出身的著名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多年主持中美洲的考古发掘工作。他编辑出版了所发现的全部玛雅手稿和铭文，在《全景玛雅》一书中，他详尽而生动地叙述了玛雅人的人文文化和社会状况，为后人留下了研究玛雅的最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全书综合了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地方志等多种学科。本书作者在引用时大多只提及被引用者的姓，故有些难以查考。——译者

中仅有少数例外。中世纪的思想均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钳制，即人是有罪的，生于斯世就灾难深重，轻如火花一般地飞升消失；世界终究会达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并无自身的意义，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种序曲。直至商业、发明和自然科学将人类从这一循环和基督教时代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类才能为俗世之人设想一种广阔无垠的未来，设想为人类的利益战胜物质世界，设想为这个星球上的美好生活而改善各种条件，而无需顾及将来的任何可能。最终时机来临，条件成熟，进步的观念在西方世界诞生。读者面前的这部卷帙即以清晰明了的语言，阐述了这一成果鹏硕的观念的幼芽萌生和茁壮发展史。

本书作者、剑桥大学已故教授约翰·巴·伯瑞，是一位造诣精深的学者和哲思奥蹟的思想家。此处必须着重叙述其生活和著述两个方面。他严格地坚持进行一丝不苟的研究，对各家材料具有批评精神，运用科学方法以探求关于人物和事件的真理。对于只注重修辞的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伯瑞没有丝毫的耐心。有些理论家试图以内心的冥想杜撰出对人类演化的种种解释，却不去参照确凿的事实，而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现实。伯瑞教授以确定无疑的语言对所有这些理论家提出了谴责。黑格尔和克劳斯<sup>1</sup>试图揭示“人类历史一般发展过程中的理性成分”，而伯瑞名之为“辉煌的失败”，因为他们的理论体系“的特征就是对事实和细节的了解不足”，两位哲人均寻求给社会发展历史强加上一种与现实不符的僵硬框架或构想。伯瑞辩论道，黑格尔所谓的宇宙的终极构划(the ultimate design of the universe)，其依据必须在被称为历史的人类体验的实质中去寻找，也必须在其中发现，并总是在此种情况下适当地参照各种事实。

然而，尽管伯瑞在自己的研究中一贯强调严格、准确地坚持史实的必要性，他也展示出作为一位思想家的高质量探究，广泛搜求史实的内

---

<sup>1</sup> 克劳斯(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 1781—1832)，德国哲学家，他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万有在神论”(pantheism, 也译“超泛神论”)，即认为世界是神的一部分。他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特别在西班牙，极大地影响了19、20世纪西班牙教育的发展方向。著有《自然法基础，或法的理念的哲学原理》(*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 oder philosophischer Grundriß des Ideales des Rechts*, 1803)等。译者

在关系和意义的证据。在1904年于圣路易斯博览会<sup>1</sup>期间召开的艺术与科学大会上,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说道:“我无法想象所搜集的各种事实或事实片段所具有的丝毫理论意义,除非这些事实根据理性而意味着某种东西,除非我们能够有望确定其在整个现实构成的体系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这一观点因伯瑞所坚持的一种信念而得以巩固,即历史所具有的“意义不同于更高层次的动物学的意义,历史也不仅仅是自然中的演化过程的延续。如果思想并非自然过程(process of nature)的结果,而是前提,那么即可以由此断言,以思想为其特征和引导力量的历史则属一种不同于自然王国的观念类型,因而也需要做出不同的阐释。由此,出现了历史哲学。这一短语是各家纷争的领地上的高高飘扬的大纛。它的出现就意味着对理性原则的研究,而一般认为理性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揭示,归因于在现实条件下人类思维的相互协作与相互作用。如果历史哲学并非虚幻,那么历史就意味着以最充分的方式揭示精神本真,也只有以这种方式揭示的精神本真对处于如此特殊现实条件下的我们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将历史作为理性的一种运动加以阐释,揭示其在现实条件下的本质,这种阐释的可能性似乎是可资奠基的唯一前提,以证明‘为历史而历史’的假设言之成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做出这种断言时,伯瑞并非基于超验的虚构,而是密切关注已知或有史记载的人类体验,以之作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即使“最严密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对其立场质疑。

在寻求一套观念,将关于人类发展的那些令人颇感困惑的事实串接起来的过程中,伯瑞很早就意识到,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不能局限于战争和政治的历史,而必须延伸,以涵盖穿越时间运动的全部文明。他在剑桥的就职演讲中阐述道:

---

1 圣路易斯博览会(St. Louis Exposition),又称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St. Louis World's Fair),于1904年4月30日在全美第四大城市圣路易斯举行。有来自各大洲的30余个国家参加,连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清廷也破天荒首度派亲王溥伦(Pu Lun)率团出席开幕盛会,并建立展馆,展示中华文物之美。一般所称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其实全名是路易斯安那采购博览会(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以纪念美国获得路易斯安那一百周年的重大史实。——译者



历史研究的诸多革新之一,就是将其拓展到更广阔的视阈……兰克<sup>1</sup>坚持政治历史(国家史<sup>2</sup>)这一唯我独尊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正日渐让位于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界定,从而使研究素材涵盖了一切历史记载,包括从石器时代以降的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文化和著述以及社会中的人,而不去顾及这些记载的性质……向更宽泛构想的拓展也得到民族运动的支持,因为民族运动为将人民的观念区别于国家的观念提供了证据;但是,这一构想取得最后胜利的保障是将其发展的原则和“历史方法”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全部表征——社会制度、法律、贸易、工业艺术和艺术、宗教、哲学、民俗学、文学。

由此,历史便获得了更加丰富和更具包容性的意义,也更加深刻地洞察人类脑力和人类情感的全部表征中所存在的持久的相互作用和互惠互利。当然,在实践中,劳动是分工的;政治历史和文明的各个部分的历史能够而且也必须分别研究。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中的相互联系,不应该割裂任何一个部分,而应该在所有的历史科学中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构建一种理想——这一理想不因其不切实际而价值稍减——即关于一个民族真实历史或关于世界的真实历史的理想,这种历史中的每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和智力发展的每个表征的阐述均应观照其余,同时观照其对于发展或衰落的意义。这一切均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用这种方法能够解决宇宙的神秘莫测吗?能够从驳杂纷繁、光怪

1 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德国史学家,倡导重视一手史料的实证学风,形成当时声名显赫的德国史学的兰克学派。尽管兰克本人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史,他也非常重视思想观念,推崇狄尔泰引进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但是在注重归纳通则的社会学等学科发展的强劲冲击下,他仍然被认为是正统史学的鼻祖。20世纪20年代,一味地研究政治史的学风在德国受到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蓝普莱希特的尖锐攻讦。这一时期在德国是所谓“蓝普莱希特论战”(Lamprecht controversy)的年代。莱比锡大学教授蓝普莱希特大力提倡群众的文化史和经济史,激烈反对单纯叙述个人的政治史,认为历史学基本上是一门社会心理科学,著有《近代历史学》等。兰克与蓝普莱希特的史学观念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本书兰克的原文为“Lanke”,疑有误。——译者

2 原文此词为斜体德语“Staatengeschichte”,意为“国家的历史”。——译者

陆离的事实中得出关于整个宇宙结构的不容置疑的结论吗？作为自己时代和同代人中的智者，伯瑞率先使自己熟悉了研究领域内的伟大思想家的著述——比如黑格尔、兰克、马克思和蓝普莱希特<sup>1</sup>等。伯瑞在表述观点时谨慎有加，而非武断傲慢。不过，他却颇具胆识地大胆提出了一种猜测。

在经年累月地研究卷帙浩繁的关于人类的记载之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类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发现，而两者对他所承担起来的研究任务都非常重要。第一个发现是由一位希腊诗人做出的。“对于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而言，希腊悲剧作家的著作中也许再也没有哪一章节，像索福克勒斯<sup>2</sup>创作的《安提戈涅》中的那段歌咏那样具有启发意义。我们似乎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现了人类首次惊起的冥思，其时人在突然的顿悟中进入沉思：人竟是人之所是，竟然创造了已经创造的一切——竟然创造出除其他事物之外的城邦，这是何等地奇妙！人似乎是骤然间醒悟，意识到自身便是世界的奇迹”。<sup>3</sup>因此，人类在公元前5世纪就意识到，自己便是世界上创造奇迹的力量——征服了原野上的走兽，征服了空中的飞禽，征服了大海上的狂风，也征服了漠然的地球。

人类演化的第二个伟大阶段来临时，人类意识到了那些尚有可为之处，进步的观念冲击了对恶性循环或满足于现状的信念。在广泛研究古代和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伯瑞偶然发现了这一观念，并开始将其应用于对自己的各种研究的重新审视。从现在可以获得的关于伯瑞个人生活的有限记载中，有可能了解到他发现这一思想工具的确切时间。但是，进步的观念似乎在他中年时已经在头脑中扎下了根基。无论如何，在他于1920年出版、现在重印的这部著作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1 蓝普莱希特(Karl Gottfried Lamprecht, 1856—1915),德国历史学家,创立关于心理因素的系统历史理论的最早学者之一,研究领域涉及历史、政治科学、艺术、经济等。——译者

2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生在雅典西北郊科洛诺斯乡,年轻时即显露出音乐方面的才华,共著120多个剧本,其中较著名有《埃阿斯》(Ajax)、《奥狄浦斯王》(Oedipus Rex)等。就戏剧艺术而论,古代批评家一般都认为他是最杰出的希腊悲剧家。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把他比作荷马,法国诗人拉辛认为《奥狄浦斯王》是一部完美的悲剧,德国批评家莱辛和诗人歌德对索福克勒斯的技巧给予很高的评价。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反映了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城邦的法制之间的冲突,讴歌安提戈涅不畏强暴、反对专制暴君的崇高精神。——译者

3 马文(Marvin):《逼真的过去》(The Living Past),第74页。

这一观念就一直是他展示智力才能过程中的根本组成部分。

对本书的这种解释的支持证据可以在伯瑞的就职演说中发现，他于1903年担任剑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讲，远在他阐述有关进步的观念的论文之前。当时，他以确定无疑的语言说道：“只有人们把握了人类的进步的观念，才能形成或阐述关于历史之于政治家和公民的事务之意义的正确观念。这是一种彻底转化观念且具有伟大意义的构想，从而使历史得以界定自己的覆盖视阈……世界尚未充分意识到关于历史的观念的彻底转化（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转化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全部意义，而这种转化的形成则归因于有关发展的学说的提出。对于那些直接接触这种转化的人，总是很难意识到在智力或精神进步中所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因为这些发展是缓慢的和渐进的。但是，我们大可果敢地说，在历史研究的记载中，上个世纪（19世纪）不仅与公元前5世纪一样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也同样标志着人类自觉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换言之，阐释历史神秘性的线索要在发展或进步的观念中寻找。果如是，那么这显然是人类思维迄今所做出的最重大的发现，对人类所具有的各种含义几乎超越了任何想象。

伯瑞将发展的观念置于对历史进行思考的中心地位，自然便迅疾捕捉到了有机体的进化和达尔文学说对于详细阐述自己的假设的重要意义。他在1909年发表的题为“达尔文学说与历史”（*Darwinism and History*）的文章中，探讨了达尔文学说的重要意义。由于完全熟悉从希罗多德到蓝普莱希特的关于历史的著述和思考的整个过程，因此伯瑞立即意识到，自然科学导致产生有机体进化学说的过程与历史编纂的过程相似。他阐述道：“19世纪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是由同样的一般原则决定的，并以其为特征，这一原则便是同步发展的自然研究的基础，即遗传的观念。关于自然的‘历史的’构想产生了太阳系的发展历史、地球的发展历史以及地球上有机体的各种谱系，并且在自然科学界引发革命。这种‘历史的’构想与人类历史是连续、遗传和因果过程的构想属于同一种思想——这种构想也在历史研究领域引发革命，并使之科学化……遗传原则、渐进的发展、一般规律、时间的重要性、社会作为有机集合体的构想、作为精神的自我演化的历史的形而上学理论——所有这些观念均表明，历史所探求的发展一直沿着独立而又是与自然的各学科发展相互平行的轨迹。”

历史学家已经建立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各种理论因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得到了巩固。“一度流行的人类突创说(ex abrupto)曾经置历史于孤立的境地,使其与关于自然的科学断绝联系。人类学研究的是在人的意义上(anthropos)的动物,现在已与动物学相互交融,并将后者与历史联系起来。人类现在的存在状态是由一系列彻底转变造成的结果,这些转变可以追溯到人类最初的发展阶段,即历史的想象的(不可企及的)发端。然而,这一发端的出现源于一个没有间断的连续发展过程,而发展过程又可以上溯到一种四肢动物(quadrimane)的祖先,(根据达尔文的假设)更可以进一步上溯到海鞘类(ascidian)海洋动物,继而经过遥远的发展时期达到最低级形式的有机体……生命进化致使未开化人类的出现,而这种连续进步的构想有助于巩固另外一种构想——也增强了人们对这一构想的信念——即人类的文明史自身也是一种连续的渐进发展”。

伯瑞以一种审慎的眼光看待进化论,因而并没有试图幼稚而不加批评地将关于有机体进化的现成解释应用于文明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学家可以运用进化论理论——适应环境,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等——以阐释人类发展的某些阶段。不过,他认为这些观念难以有助于深入地理解人类的进化。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忠告:“可以说,就有记载历史的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和人类运动而言,自然环境已不再机械地发挥作用,若要影响人类的行为,必须首先影响其意志;其间因果关系的精神特征使这一问题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可以提供论据加以证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有意识的精神因素的主导作用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属性,因为精神因素事实上创生了新的条件(发明、社会制度,等等),而这些条件则限制和阻碍了自然选择的作用,控制和降低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现在,多数思想家认为,文明发展的主要线索必须在精神领域中寻找。”

伯瑞还从自然科学演化出另一种对于自己思考人类进化具有深刻意义的观念——即人类面前的无限时间广度的观念。他认为:“科学向人类表明,虽然有难以数计的灾难,人类依然将在这一星球上生存数亿万年,这里的自然条件未必会阻碍人类自身的发展或削弱人类自身的力量。对于这段时间而言,人类整个六七千年的有记载的历史不过是短暂的一瞬。”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毅然决然地转向过去，而伯瑞则不然，他总是关注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广漠而模糊的未知未来，就像一堵烟笼雾罩的壁垒，每个瞬间都在隐退，同时发生着难以辨识的世界范围内的变化，悄然无声的巨变和革新，还有那些闻所未闻的观念和新生的宗教。如果我们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把握历史的统一性，那么就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尽管我们无法预言在无限的时间里事物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化，我们也无法在展望未来时，拥有一双‘大千世界所独具的先知的慧眼，冥思未来的苍生万物’，然而模糊的未来大可被感觉得到是一种控制人类视阈的观念。这一观念制约着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将我们所称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序列看作是一路引向现代和20世纪；它要求我们将直至此刻的整个序列看作很可能不过是社会和精神发展之嚆矢，其终结在我们看来则是在未来的无数个千年之后。过去的所有时代仅仅是无限的历史列车的最初几节，而且很可能是最少精彩的几节”。

尽管伯瑞有效地利用了自然科学的一个方面，即进化论对作为历史的线索的进步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并未在自己的阐释哲学中详细论述应用科学这另一个分支的重要意义。然而，技术是现代文明的根本基础，提供了一种作为坚实驱动的动力，显示了实现对自然的渐进式征服的各种方法。即便从表面上看来，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如此，技术很少受到历史思想家的关注，也很少受到那些研究未来视阈的社会观察家的关注。技术专家们全神贯注于现实的问题，而忽视了自己研究中的哲学层面。他们公布自己的发现时所使用的通常是物理学和力学方面的术语——机器、千瓦时、运动的里程和制造的物品。他们很少涉及自己的研究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也很少涉及他们的活动必然导致的社会变动，以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sup>1</sup>但是，与进步的观念密切相关，也与对过去二百年中所发生的一切和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阐释密切相关的所有观念，其中最具相关性的莫过于技术。

当然，人们所称的“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已经在经济历史学家的许多著述中得到描述——高速运输和高速通讯的应用，周围是庞大城市化

---

<sup>1</sup> 关于现代世界的技术视界，参见著名工程师的文集《走近文明》(Toward Civilisation, 查尔斯·A·比尔德编)。

聚集区的工厂体系的兴起,劳动的分工,以及在封建体制的废墟上崛起的资本主义体制。但是,这些论述一般均有两种局限。一是没有最大限度地追溯技术对于文明的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包括诗歌和艺术;一是通常不将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既成事实进行研究。的确,“革命”这一术语在这方面有误导之嫌,因为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种秩序被颠覆,而另一种秩序取而代之。这些类比并不适用于我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农民阶层也许会起义造反,打倒地主,焚烧城堡,建立一种农业时代的民主制度。然而,前机器(pre-machine)经济中的技术所引发的革命决不是这种有保留的事件。技术确实有助于资产阶级征服占有土地的贵族,但这只是技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而不是技术成就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相反,这只是无限进化的开端,决不受到时间的约束。在所谓的“工业革命”之后一百年,技术显然仅仅处于其发展过程的开始阶段。到那一时间,技术已经经历了粗糙的蒸汽机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并以内燃机和发电机开启了又一次“革命”。因此,在研究技术对社会进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时,我们面对着的不仅有已经完成的一切,还有征服自然物质的方法也在迅疾地日新月异。

那么,成为现代进步的至高无上的工具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呢?尽管这一术语被大量地运用于现在的著述之中,但其作为事实存在和潜在力量的意义还从未得到探究和界定。的确,其分支极其广泛,因而研究既困难重重又前途难料。就狭义而言,技术包括全部现存的实验室、机器和已经开发、掌握并在发挥作用的各种工艺。不过技术远远不止于客观事实存在。

技术在起源和作用方面与纯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是与其关系最远的数学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技术蕴涵着关于自然的哲学和一种方法——一种对物质和工作的态度——因此也是一种具有高度张力的主观力量。技术在其视阈内涵盖了大量的观念,对有些观念的探究已经达到了显然的限度,而有些观念尚处于所提出的问题的形式和自然出现的问题的形式,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都是模糊不清的。尽管技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与一般称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类型相互联系,但技术在内在本质上却超越了一切社会形式和已经形成的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等全部社会遗产。它不带丝毫偏见地适用于日本的封建武士、美国的实业家和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技术在其应用范围上是

普遍的,因而任何民族、阶级、时代、政府或人民都无法对其实施垄断。就宽容而言,它超过了一切宗教。技术是工作的一种工具,这种工作对人类能量的吸引超过了战争所具有的诱惑力;技术是一种社会溶剂和调节器,是一种关于行为的哲学。因此,技术必须被置入历史的主流之中。惟有如此,对历史过程的观察才会是正确的,也惟有如此,才能以某种方式洞察“未知未来中的隐秘的潜在危险”。

正是技术的这种动态的特性,使其对于进步的观念显得非常重要。后者认为人类一直是从远古文明的原始阶段缓慢地向前发展;而前者则表明通过展示其成就和揭示其运作方法所能够实现的一切。曾经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表面上看来不可能的东西也许可以被超越。人类围绕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古代理论因显而易见的事实而被彻底否定。完全受制于经验常规的静态社会的中世纪观念也因各种事件的发生而被风卷残云般地抛弃。

然而,技术的推动力量是否会以失败而告终呢?伯瑞提出,进步的观念本身也许会消失,并被另一种关于历史和生命的哲学所替代。然而,技术中有一种内在的东西似乎可以保证技术无限地发挥作用。首先,技术中没有任何终极的东西。技术领域内的问题的解决总是开启了对新问题的探究。某个专业内的活动会引发出相邻的科学专业需要研究的问题。化学领域内的一个发现会动摇物理学领域内某个不够精确的东西的基础。由此,人类对一般意义上的身体的舒适、安全、健康和幸福的热情追求,总是成为技术探索的潜在动力。只要人类喜爱殷实而不是饥馑,喜爱健康而不是疾病,技术就一直会保持其活力。无论如何,技术的背后有人类无法满足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会引导着人类去用望远镜探求天宇,潜到海洋的底部,探索原子世界。也许有一天技术不再发展,从而终止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而在这之前,好奇心也一定已经从人类的天性中渐渐消失。

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技术被应用于阐释在进步的观念下进行表述的历史。在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技术必须涉及大量的物质,及其与大量粒子的相互关系,将个体粒子的显见特性简化为一般规律。研究历史也是如此。

在建立于战争和政治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中,一个性格超凡的单个之人的领导对于克敌制胜或昌盛不衰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机

缘”在此起着支配作用，因而某些学者在考查这一现象的作用之时则围绕伟人理论阐释历史：人民大众毫无价值，他们不过是这场游戏中的俗子凡夫，而上帝、机缘或命运不时地遣送英雄来引导大众，拯救大众——或者也许是将他们投入战争，使无数的人们战死疆场。

在建立于技术的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中，武士、牧师和政治领袖都隐没于背景之中，亦或他们在发挥作用时无论如何都必须与机器所造就的经济现实保持一致。因此，技术巩固了历史进化的各种社会层面，而不是个体层面。这样，历史必须研究人民大众，他们相互联系地组织在一起，并受到一般规律的支配。故此，在技术领域富有成效的统计测量法大有可能应用于追踪历史运动的脉络。

由于19世纪之前历史记载的匮乏，历史学家在探究早期历史时几乎很少运用统计方法。但是，现在在公众和私人的支持下逐渐积累起来大量的权威资料，这便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可能更加准确地描述人类发展的进程。例如，大众健康是否取得了进步？不容置疑的材料保证了这样一种结论的正确性，即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死亡率正日渐下降。在公元2000年，将有可能回答我们现在只能做出猜测的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取得了进步，那么进步会是大众的进步，可以用平均值进行衡量，也可以通过图表进行展示。

似乎也有理由认为，技术正在产生着其他方面的社会影响，而这些影响会造成对过去的恢复不可能精确。通过新闻界、无线电台、铁路、邮政和大量的教育设施，技术延伸了教化，传播了信息，拓展了人民大众的社会意识。审查和专制也许会不时地延缓各处的这一过程，但是大众蒙昧状态的瓦解将会迅速发展。因此，难以想象尚能再度奠定愚民政策的基础，正如罗马贵族的蓄奴制度或中世纪的僧侣封建统治那样。根据这一显然可以证明的假设，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都绝对不会重蹈遥远过去的覆辙。就此而言，文明的进程决不会是西绪福斯的徒劳工程。<sup>1</sup>就整体而言，历史研究揭示出人类起源时的原始未开发状态和现代最佳社会秩序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样的断言也许并不是对

---

1 西绪福斯(Sisyphus)，典出希腊神话。西绪福斯是希腊科林斯国奸诈而又贪婪的君主，死后被打入地狱的最底层。他在那里滚动一块沉重的石头上山，但每次滚到山顶，石头都会再次滚下山去。因此，他每天都必须周而复始地劳作，实施着一项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译者



人类起源时的悲剧和残忍特征视而不见；技术通过不断地展示各种潜在的可能而不容置疑地巩固了进步的观念，除非出现一种全新的演绎推理(synthesis)，从而极大地加速继承于过去且易于铸成大错的发展步伐。

但是在这一切论述之后，进步的观念究竟是否具有自然规律的有效性——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它是否是从历史史实中得出的结论，而历史则是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强加在我们的身上？回答必然是否定的。伯瑞在这里并非一个独断论者。正如《论文选读》(*Selected Essays*)的编者哈罗德·坦普利<sup>1</sup>先生所言：“进步的观念非常有用，但它既非是严格科学的，也非等同于进化论中的各种观念。伯瑞的确说到人类在未来必须攀登的‘无数级台阶’，而且曾经也许还相信运动是向上的。但是，他对未来的这种信心与其说是一种信念，毋宁说是一种希望。即便他感觉到了一种信念，也不会坚持认为可以用科学对其加以辩护。”

在后文的有几页(原著第335—336页)中，伯瑞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必须切记，进化本身在应用于社会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的运动是朝向一种令人愉悦的幸福进发。它是一个中性的科学观念，也许可以是引以为乐观的，也许与悲观主义同出一辙。根据不同的观点，进化也许是一种残酷的判决，也许可以确保稳步的改进，而事实上对其阐释一直有上述两种方式。”伯瑞的全书结尾(原著第351—352页)是对“终结的幻想”(the illusion of finality)的警告。尚未作出最终的定论。在时代的漫长岁月中，各种观念比肩接踵，一时间杂然纷呈，传之后世，为伟大而神秘的新颖观念开荆辟莽——即“宇宙的终极构划”。

不过，即使无法将进步的观念看做对历史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阐释，这也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作为政治家和经济领域的领导者的指导原则。现在，富于洞察力的学者不断提出的很多历史学理论，已经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每个民族都从对其过去的思考中获得启示和指导。或许可以说，每部宏篇巨制的历史著作都至少部分地是由作

1 哈罗德·坦普利(Harold William Vazelle Temperley, 1879—1939)，英国历史学家、现代史教授，其研究领域为现代外交史，著有《塞尔维亚史》(*History of Serbia*, 1917)，另于1906—1910年间与人合编《英国论述战争起源文献》(*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译者